



华夏文明说 汉服

□ 郑贞富

洛城“诗歌代言人” 当仁不让白居易

在近日播出的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上,嘉宾蒙曼、康震结合考题讲述了白居易在洛阳生活的故事,引来不少网友关注。作为洛阳的“诗歌代言人”,白居易在千年后再次“圈粉”无数。

在洛留诗九百首

节目现场,按照要求,选手谢雅丹需要答出一联白居易在洛阳写的诗句,但是她错失良机,回答错误。“我想到了一句,莫悲金谷园中月,莫叹天津桥上春。”嘉宾蒙曼在点评时说,白居易在洛阳一共生活了18年,“写的诗好多好多,写了900多首诗”。

蒙曼所说的诗句,出自白居易晚年所作的《和友人洛中春感》,其中的金谷园、天津桥都是隋唐洛阳城的名胜。白居易通过该诗告诉大家,即使再好的景色,在历史长河中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件呈现出不同的风貌,让人有不同感受,因而不必过分悲叹,表现了他晚年的豁达情怀。

“今年共君听,同在洛阳城。”如果要为洛阳城寻找一位“诗歌代言人”,白居易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。白居易出生在离洛阳不远的新郑,少年时期长期生活在洛阳附近。唐穆宗长庆四年(公元824年)他在洛阳买下宅院,唐文宗大和三年(公元829年)他回洛阳定居,整个晚年时光都在洛阳度过。

一腔诗情重尊老

节目中还提到了白居易晚年在洛阳颇为消闲,常常组织老年人联谊会,有诗云:“七人五百七十岁,拖紫纡朱垂白须。”

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薛瑞泽说,这联诗句描述了白居易和老友等一群老年人聚会时的场景。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源远流长,在唐代,一些年龄大的文人和致仕的官员以文会友,宴乐赋诗,曾风行一时的“尚齿会”,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。尚齿,即崇尚老年人。“尚齿会”的创始人就是白居易。

唐武宗会昌五年(公元845年)三月廿一日,致仕居洛的白居易宴请六位老友聚会履道里家中,并作诗记述了这次盛会:“七人五百七十岁,拖紫纡朱垂白须。手里无金莫叹叹,樽中有酒且欢娱。诗吟两句神还王,酒饮三杯气尚粗。魏峡狂歌教婢拍,婆娑醉舞遣孙扶。天年高过二疏傅,人数多于四皓图。除却三山五天竺,人间此会更应无。”同年夏,在龙门香山寺,白居易又与八位老人举行了一次“尚齿会”,并留下《九老图诗》。

白居易亲自组织的这两次“尚齿会”,以诗酒文会的形式,使与会的老人们有歌听、有舞看、有酒喝,并鼓励老人们能歌则歌、能舞则舞,还要求每位老人都要赋诗纪胜。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嘉宾康震结合诗意感慨:“现在就应该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乐,就应该仁者寿。”

乐天退老履道里

白居易在洛阳的宅院位于当时的履道里(也称履道坊),即现在的洛阳市洛龙区安乐街道狮子桥村,一千年前这里是隋唐洛阳城的东南一隅。

《旧唐书》卷一六六《白居易列传》记载:“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隅,东南之胜在履道里,里之胜,在西北隅。西阨(hàn)北垣第一,即白氏退老之地也。”由此可见唐代时这里风景独好,引得白居易退老后选择在此定居。履道里白居易宅院占地17亩,他还效仿苏、杭及庐山的风情修缮和经营履道里,使之成为东都名园。

唐会昌六年(公元846年),白居易卒于履道里家中,葬于龙门东山琵琶峰。此后,履道里的白居易宅院逐渐损毁。

20世纪90年代,经过考古发掘,白居易故居遗址被确定。有关部门在此树立了“履道里白居易故居遗址”的牌子,而附近的乐天路、香山路等,都体现了当代洛阳对这位伟大诗人的纪念。

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

编者按:汉服是民族精神和文明的一种符号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,汉服展现着绚丽多彩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,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。如今,“穿汉服沉浸式打卡洛阳”火爆“出圈”,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洛阳赴“汉服之约”。历史为轴,汉服为媒,千年古都身着汉服的游客提供沉浸式文旅体验,为青春洛阳加码。今起,本报推出“领略汉服之美 品读文化自信”系列文章,带您走进历史深处,共同感受传统汉服之美,品读古都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特有的自信表达。敬请关注。



大汉威仪 聂剑帆画

《左传正义》云:“中国,有服章之美谓之华,有礼仪之大故称夏。”几千年来,中华被冠以“衣冠之邦”“礼义之邦”,便是源自发达的礼乐衣冠制度。汉服不仅承载着华夏文明丰厚的历史信息,还是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、审美风尚、审美观念的外在表达。

1 垂衣裳而天下治

在纺织技术未发明前,人类以兽皮、羽毛为衣,这就是《礼记》中所说的“未有麻丝,衣其羽皮”。

在距今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,人们剥取野生葛麻类植物的纤维,用手搓或用纺轮捻,续接成线,用线织布做衣。河洛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石纺轮、陶纺轮、葛麻布片及有葛麻纤维印痕的陶片等实物。陶片上的葛麻纤维印痕,每平方厘米经纬线都在10根以上,并且有各式斜纹织法、环绕混合织法等,表明当时葛麻纺织工艺已诞生。

仰韶文化时期,就是文献记载的炎帝、黄帝时代,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出现,以葛麻纺织为代表的纺织已形成规模,全面带动了纺织工艺发展,服饰衣着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《商君书》说:“神农之世,男耕而食,妇织而衣。”《淮南子》说:“伯余(黄帝时人)之初作衣也,谈麻索缕,手经指挂,其犹网罗。”炎帝神农氏,黄帝轩辕氏,其活动的中心均是河洛地区。

《易经·系辞下》说:“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,盖取诸乾坤。”垂,垂示。衣,上

衣。裳,下服。黄帝、尧、舜以衣在上者象天,以裳在下者象地,定衣服之制而示天下礼仪,故衣裳制作取象乾坤。黄帝、尧、舜时代,是华夏文明的第一个阶段,即统一的酋邦王国时代。当时,黄河流域有三大部族,分别是华夏集团、苗蛮集团、东夷集团。

黄帝南伐苗蛮,东征东夷,统一中原后,迎来天下太平,黄帝也开始了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伟大实践。他教人们把裹身的葛麻布分成上下两部分,上身“衣”,缝制袖筒,呈前开式,下身“裳”,前后各围一片布,两端开叉。

这种上衣下裳的形制,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服装款式。从黄帝时代开始,服饰作为一种礼仪与制度,教化天下,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,黄帝制定的衣裳制度为汉服文化的起始。

“衣裳制作取象乾坤”,乾坤,就是天地阴阳。华夏服饰在设计上最明显地体现着“道法自然,天人合一”的思想。《黄帝内经》说:“人以天地之气生,四时之法成。”天地万物为一体,人与天地宇宙相和合。华夏服饰皆法天地,天玄地黄,故曰玄衣黄裳,衣以象天,饰之衣冠,因此华夏之道,象法自然。

2 华服又名为汉服

自五帝以降,夏商王朝无不对华夏服饰进行了丰富和完善。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,形成规范的礼乐制度,将伦理道德和礼仪威严通过服装这一载体表现出来。

周朝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,用周密的礼仪来规范社会,服装是每个人等级的标志,因此服装制度是立政的基础之一。周公最大的贡献之一,就是对冠服制度的完善。西周时期的礼制也是上衣下裳,只不过头要戴冠,衣裳要有等级,要有章纹,并出现相关礼服配件,这样完善的礼制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朝。

《周礼》规定,衣用正色,即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等五种原色;裳用间色,即以

正色相调配而成的混合色。制作衣裳用的衣料主要是丝绸与葛麻。每匹麻布的幅宽是二尺二寸(约今半米),如果布幅里有八十根经纱就叫一升,帝王服装要用最精细的三十升布(纁)。其经纱密度已经达到每厘米五十根,比一般的丝绸还要精密。

东周时期,创造了深衣。深衣,就是上衣和下裳相连在一起,用不同色彩的布料作为边缘(称为“衣缘”或者“纯”),其特点是使身体深藏不露,雍容典雅。

在汉代之前,华夏族的服装被称为华服。从汉代开始,由于汉帝国的强盛,华夏族又被称为汉族,华服也被称为汉服。《马王堆三号汉墓简》有关于“汉服”最早的记载:“美人四人,其二楚服,二人汉服。”

西汉男女服装,仍沿袭深衣形式。服饰在整体上呈现凝重、典雅的风格。汉代的男子,主要穿着的是一种宽大袖的袍服。汉代女子一般都将头发向后梳,绾成一个髻,插上花钗作装饰。汉代对鞋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。

天津桥的故事

李重福兵乱天津桥

□ 周得京

李重福,唐中宗李显第二子,初封唐昌王,圣历三年(公元700年)又封平恩王,长安四年(公元704年)进封豫王,历迁国子祭酒、左散骑常侍。

神龙年间,韦后诬李重福与张易之兄弟“潜构成重润之罪”,由是左授濮州员外刺史,转均州刺史,不得视事。

景龙三年(公元709年),唐中宗亲祀南郊,大赦天下,流人皆放还,独李重福不得归京。他向唐中宗上表陈情,表为韦后扣押不报。

韦后当政时,专派五百兵丁到均州防范李重福。韦后伏诛后,景云元年(公元710年)八月,唐睿宗任命李重福为集州刺史。

未及行,洛阳人张灵均向李重福进计说:“大王地居嫡长,自合继为天子。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,安可越次而居大位。昔汉诛吕氏,犹迎代王,今东都百官士庶,皆愿王来。王若潜行直诣洛阳,亦是从天上落,遣人袭杀留守,即拥兵西距陕州,东下河北,天下可图也。”

江州司马郑愔亦密遣使劝重福在洛阳起事,此人曾先附张易之兄弟,后附武三思。

于是,李重福令家臣王道先到洛阳招兵买马,继之,与张灵均等诈乘驛骑潜入洛阳,在天津桥聚集数百人,皆持兵械待命。他们带领这支刚刚组成的队伍,从天津桥出发,去袭击左右屯营。

侍御史李邕从天津桥过,发现李重福率

兵作乱,骑马先到左掖门,令闭关拒守,又至右屯营,晓谕:重福作乱,令其坚守御敌。

李重福带兵先袭右屯营,右屯营坚壁不动,营中矢射如雨。无奈,只好去左掖门袭击留守。左掖门紧闭,李重福令人纵火烧之。

此时,左屯营官兵已经进逼到跟前,李重福的兵众原本是乌合之众,官军一击即溃不成军,四处逃亡。李重福随着这些散兵游勇逃出城外,躲藏在山谷间。

第二天,东都留守裴琰等派出众多兵丁,在东都城内外进行大规模搜查。李重福眼看大势已去,大呼一声,“天亡我也”,遂自投漕河而死,年31岁。

诗词辉映

洛中送人还江东

唐·储光羲
洛城春雨霁,相送下江乡。
树绿天津道,山明伊水阳。
孤舟从此去,客思一何长。
直望清波里,唯余落日光。